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4年6月23日

专家视点

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紧密相关

□高新民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的诉求与执政党、政府能否满足、如何满足这种诉求的关系，是治理问题的本源。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实现改革总目标最基本的工作路线，而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本身所包含的多种要素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由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传统的群众路线，与国家治理在多个方面紧密相关。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包含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价值观、价值取向。即强调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方向，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二是指领导方式、决策方式。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取决于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正确与否。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三是说党的各项工作最终要通过群众路线来实现，“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即工作路径。上述三个层面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党与群众关系，获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条件。

正如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一样，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今天看来，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没有疑问的，世界政党格局的变化已经证实这条真理。但需要指出的是，“走”群众路线的主体是领导机构和领导者，权力行使向度是自上而下的。这在战争年代，基于环境生存压力，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是唯一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领导者的主动性坚持群众路线。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在社会利益关系已经成为决定党的群众基础是巩固扩大还是流失的决定性因素的背景下，能否坚持走群众路线，就不仅仅是领导者领导机构的主动性问题，更需要依靠制度化去引导、约束领导机构领导者必须走群众路线，需要有特定通道提供给群众，使其能够依据法定的途径参与到与己相关的公共事务中来，规制领导机构与领导者不至于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那样脱离社会，可以不依赖领导者的个人注意力和个人好恶而表达人们意愿。这同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坚持与发展，与国家治理程度治理方式高度耦合，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 国家治理与党的群众路线在调节社会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协商民主等多个方面具有高度关联性和耦合性。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把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与群众路线、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融为一体化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普通民众不是被动地创造历史，其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巨大的历史事变中，也体现在日常事务中。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的每一重大进步，都与基层社会的创新分不开，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民营企业的崛起等。甚至政治生活中的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劳教制度等，也与社会反映、民众舆论相关。民众的参与，既使群众路线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也使国家治理获得了新的元素。

调节社会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既是国家治理的题中之义，也是坚持群众路线之需。当下多元利益群体并存且博弈之态明显，对执政党和政府如何代表民众利益提出多方面考验。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期，社会利益分化尚未成为社会主要问题，但在改革深化到一定阶段后，呈现出新的特点。比如，各利益群体分享改革成果的迫切性和直接性更突出，各阶层对分享改革红利的期盼更强烈，而资源总量有限，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使得改革的复杂性更为突出，社会关系的调整更迫切。即使在具体问题上，无论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还是教育医疗资源的调整，无论是养老金并轨之议还是住房公积金“公正”之争，民众参与议政之势日益强烈，公开透明、开放式决策已然成为大多数人共识。如果延续少数人决策、政府执行的模式，会遇到民众的质疑，更不要说地方或基层一些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换言之，社会关系的调节既需尊重民意又需科学合理，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大的转变，甚至是系统性转变。从基层实践来看，社会共治是基本治理模式，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公众都是社会治理力量。群众路线和国家治理都意味着真正实现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和社会治理的依靠力量，民众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中，以党的领导帮助民众组织起来，在社会治理中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

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共同载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新时期的最大发展，就是基层民众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们以制度化方式参与到村庄或社区决策过程中，为共产党执政和现存国家权力机构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同时原本作为决策方式工作方式的群众路线，被拓展其内涵，意义深远。其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精神实质，如民主、公开、法治、效率等，需要有具体的实现途径，而基层民主参与尤其是协商民主制度，恰恰为现代国家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途径；其二，群众路线要求领导机构、领导者倾听基层社会诉求，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这又与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相互依存。在实践中，互联网、新型媒体的出现为民众参与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民众参与决策、参与监督已经成为社会主流趋势。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公共舆论事件，大多数与决策过程中民众缺少参与决策的通道相关。其实，毛泽东当年提出群众路线时，主要强调领导者和领导机构主动到基层寻求意见，属于“点”上的调研性质。但在今天，仅靠领导者素质和自觉性到民众中去远远不够，而民主参与、对话协商则把民众视为主动参与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领导者、领导机构单向度调研的不足，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实践表明，群众路线必须坚持，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有新表现、新内涵，把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主张，与群众路线、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相联系，融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

理论研究

应重视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论”思想

□李海青

“什么是社会主义”是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搞清楚的问题。按照传统理解，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共产主义是一个要经过很长历史时段才能实现的美好社会形态。此即所谓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论”理解。那么，这一传统理解视角对于把握社会主义而言是否具有唯一性呢？一方面，应看到，这种“社会形态论”的理解聚焦于未来的理想目标、美好结果与应然状态，突出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达到的层次高度，指明了人类社会依循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必然走向，因而具有极强的终极价值定位和重要功能定向意义。但另一方面，亦应认识到，这种“社会形态论”的理解虽极为重要，但对把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言并不全面。如果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在遥远未来才能实现的美好理想，即使它的实现具有历史必然性，那又如何对当下的人产生持久的吸引力呢？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逻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更是一个从现实的人出发，不断满足人的现实利益需求、不断推进人的自身发展、不断实现社会理想的持续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运动。

在阐述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了从“现实的人”出发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现实的人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处于实际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的。从现实的人出发，就必须具体分析现实社会的生产发展、分工状况，分析与生产发展及分工状况相对应的各个阶层的性质、特点、力量状况，分析社会公众的现实需求与愿望，了解整个社会结构状况。这样，从现实的人出发进行考察就一步步展现为对特定社会的全面而系统的唯物史观分析。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从现实的人出发”的研究方法论对于理解社会主义而言就具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恰恰是依据“从现实的人出发”这一哲学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从现实出发的持续历史过程与历史运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对社会主义“现实运动论”的理解。在此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并非是指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而是说对共产主义理念不能人为设想、主观设定，纯粹从头脑出发认为应该如何，而是必须把共产主义放在现实的基础上与历史的条件下进行研究与探讨。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的，要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概而言之，从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和探讨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就在于其以客观现实及其不断变化为依据，在不断反思、批判现存状况中探索社会革新之道。确实，社会主义只有从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出发，关心现实的人，不断满足人的现实利益需求，它作为一种理念与制度才会具有吸引力。如此，社会主义才具有现实性。正像邓小平指出的：“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当下的实践效果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恒久吸引力与万古长青。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现实运动论”思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关注不够。恰恰因为对其缺乏充分的重视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中很长时间都存在着指导思想脱离实际、忽视人的现实利益，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严重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重贯彻群众路线。实际上，不论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还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在哲学思维上所体现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方法论原则。换言之，我们党对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强调把握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方法论真谛，恰恰符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论”思想。就此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与发展的巨大成就，一方面说明了党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现实运动论”思想的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形态，同时又是一个现实运动过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发挥着未来的价值定向功能，作为一个现实运动过程，发挥着当下的凝聚吸引功能。我们既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美好理想而只空谈未来甚至把理想与现实混同，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现实运动过程只注重当下甚至放弃远大理想。社会主义作为现实运动过程与美好社会理想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具体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而言，在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前提下，从现实运动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既要心怀高远，又要脚踏实地，既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与目标理念，又要注意依据现实条件，做好现实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必须用唯物史观看待事物，既要志存高远守护革命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干好现实工作，把二者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也正是在现实建设与发展的持续推进过程中，社会主义在不断显现优越性、产生吸引力的同时，向着更为理想的状态迈进。

未被整理到“南方谈话”要点中的“要点”

□倪德刚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其内容和重大意义众所周知。《要点》不是全部，邓小平从1992年1月17日到2月21日，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南方考察过程中，尚有若干重要谈话内容未被收录到《要点》之中。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根据《邓小平年谱》，将邓小平南方谈话未被整理到《要点》中的“要点”整理出来，希望能为大家更准确更完整地理解邓小平理论，提供一点帮助。

战胜灾害，只能“两靠”。邓小平南巡途中第一次谈话较多的是在长沙火车站，当听到1991年湖南北部发生洪涝灾害、南部发生旱灾，但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农业大丰收时说：“这样的大灾害，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面对灾害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力、号召力、组织力、领导力，南方谈话后，我们应对各类重大自然灾害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两靠”的远见和正确性。

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才实现。改革开放是手段，现代化是目的；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就是空想。邓小平在参观深圳市容时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当时要搞几个特区，你们深圳靠近香港，珠海靠近澳门，厦门靠近台湾，汕头是侨乡，也是靠近台湾，所以先在你们这些地方搞特区。”“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才能实现。”

中国一乱，便是一片灾难。我们党怕犯颠覆性错误，怕折腾，更怕乱。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在观看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模型时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一乱，便是一片灾难。”邓小平深知中国近代以来的“乱”及其灾难性的后果，更亲身体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乱”和苦难。他对中国“乱”的后果做出过具体阐述。他说：“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落后，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他还警告说：“一个国家要乱很容易，一夜之间就可以乱起来；但是，寻求较长期的稳定却需要花费很多心血、很多时间，而且要有正确的政策。”

要夹着尾巴做人。这句话是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俯瞰深圳市容时讲的，他说：“我们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的时间不多呀！世界市场很紧，不容易竞争。要夹着尾巴做人。”夹着尾巴做人，不是怕谁，而是在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取得阶段性历史成绩后，不要骄傲、不要忘乎所以。关键是要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审时度势地把中国发展强大起来。

让全国人民都发财。1992年1月22日上午，邓小平游览深圳市仙湖公园，在公园种植一棵高山榕。在有人介绍有一种树叫“发财树”时，邓小平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这句看似玩笑话，却真切地反映出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的真心愿望。

中国没有自己的品牌，就要受人欺负，中国每天都要有新东西。邓小平在参观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厂时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品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品牌意识不强，产品在世界影响力很低。品牌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综合实力的象征，表面上看是品牌，实际上是占领世界市场、争夺世界资源的主要抓手。所以，邓小平在珠海考察期间强调：“企业要创品牌，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牌子。”“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有一席之地。中国应该每年有新东西，每天都有新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很有希望。这十年进步很快，但今后进步会比这十年更快。不要满足现在的状况，要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不断创造出新东西，才能有竞争力。”

开放嘛，留学人员进出都要自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时，中国留学生还没有今天这么多，这么普及。1992年1月25日，邓小平在参观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时说：“我要和大家拉一拉手。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么多年轻的科技队伍。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一百个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这个公司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就有一百人，学历比那时高多了。珠海这个地方就容纳了这么多高科技人才，从全国来说，就更多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有希望啊！从中国出去的科学工作者，有很多人很想念祖国，这很好啊！要把他们吸引回来。”在陪同人员汇报，广东已制定政策欢迎留学生回来，也允许他们再出去时，邓小平说：“这个好嘛！这要有点胆量。不是讲改革开放吗？开放嘛，进出就是要自由一点嘛。回来不适合，他可以走。事实上，绝大多数留学生回来后，只要安排妥当，是不会出去的。”

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集体化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历来尊重农民的意愿，当他在珠海听到个体企业发展遇到一些困难时，说：“以后分工越来越细，工艺越来越新，一家一户办不了，最终要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不过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不要搞运动，他们实际上会朝这个方向走，集体化也是社会主义。”

集体化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很重要。其一，所有制是集体化的，就是社会主义。其二，经营方式集体化的，就是社会主义。其三，就是说，判断经济性质是一个动态过程，即所有制、经营方式，一旦集体化了其性质就是社会主义的。其四，还可以说，“公有”变成集体的仍然是社会主义。其五，这个重要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为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福利社会不是出路，家庭是个好东西。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更是我们国家日益突出的现实问题，怎样解决养老，影响发展、影响稳定、影响形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期间，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邓小平这段话核心有两点：第一，在养老这个问题上，中国不能搞福利社会，国家、社会负担不起。第二，养老要以家庭为主。这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也符合中国家庭养老观。

用人胆子要大，要从基层搞起，二十一世纪是年轻人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要敢闯敢试。在这次谈话过程中，邓小平还提出了用人也要胆子大的问题。1992年2月8日晚上，在游览黄浦江时说：“二十一世纪是年轻人的。干部要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有缺点？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年轻人要从基层搞起来，现在的基层比过去更大。”

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回答理论是非靠实践，回答实践中的对错也必须靠实践。邓小平在上海考察时说：“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关于实践这个标准最硬，不会做假的思想很重要，是我们检验过去改革得失与未来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用最硬这个标准衡量以往的改革理论与实践，正确的必须坚持，不正确的必须坚决改革；用最硬这个标准指导当下与未来改革就能无往而不胜。

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我相信后来居上。发挥后发优势，高度重视顶层设计是现在全党的共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就提出了这一战略思想。他在离开上海前指出：“浦东开发晚了，但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上述十二个方面的谈话内容，没有整理到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原因有两个。一是整理南方谈话时间比较短。邓小平是1992年2月21日回京的，2月28日，中共中央就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2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也就是说整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时间仅仅一周的时间。二是着眼于当时的国内外大局、大势和主要困惑问题及事关未来发展道路、方向等，着力提炼“要点”。诸如，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论等。现在看来还有若干“要点”当时并没有整理到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之中。今天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和上述十二个方面的“要点”，对于我们坚定信念搞好新一轮改革大有指导意义。

党的思想史